文脉绵延话绛县

■牛智贤

文化谈丛

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

地名的重量：从“绛老”到“天下第一县”

公元前543年，一场看似寻常的宴席，成为历史投下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晋悼夫人犒赏修筑杞城的役夫，“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引起悼夫人一行的注意。询问其年龄，老人以“四百有四十五甲子”沉着、机敏地应答，随行的师旷、史赵等晋国重臣为之震动。这段载于《左传·襄公三十年》的对话，不仅展现了先秦时代普通人应对贵族的智慧，更在不经意间，将一个地名——“绛县”，镌刻进中国行政制度的开端。

“绛老”的形象，因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立《绛县师》石碑而愈发清晰。绛县博物馆中，这位白眉舒展、手端锦食的老者，目光穿越千年，无声诉说着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的交织。而“绛老”一词，更成为长寿的文化符号，被历代文人反复吟咏，载入《辞海》。但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其背后所依托的行政实体——绛县。老者因征役问题引发朝廷对县大夫的问责，甚至导致“舆尉”被废、“县师”新立，恰恰证明当时的绛县已具备完整的职官体系，是一个运行成熟的行政单位。

地方史学研究者、绛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柴广胜认为，“县”的诞生，是周代分封制瓦解的必然产物。晋国经历“曲沃篡统”与“骊姬之乱”后，公族势力衰微，分封制难以为继，直接催生了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管理体系。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7年晋国已出现“先茅之县”，而“绛县”之名的明确记载虽稍晚，但其设县年代必早于公元前543年，且因其地处晋国故都“绛”（即“王者封畿”），更可能成为县制试验的首选。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县制加速了分封制的崩溃，为国家统一奠定基石。绛县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与楚国在边境设县侧重于军事管控不同，晋国的县制始于京畿地区，更具行政改革意义。绛县设有大夫、舆尉、县师等职官，管理赋税、役政、教化等事务，已然形成后世郡县制的雏形。正如《说文》所言：“寰者，王者封畿内县也。”绛县作为晋国核心区域的行政单元，其制度设计更系统，对后世的影响也更直接。

从“绛老”的个人命运到“天下第一县”的制度确立，绛县的历史价值在于其连续性与实证性。它既拥有《左传》的文献记载，又具备“绛县师”碑的实物佐证；既承载着县制起源的记忆，又延续着地名与文化的不绝薪火。这种跨越时空的完整脉络，使其“天下第一县”的称号并非虚名，而是对历史真实的确认。

如今，当我们站在绛县的土地上，仿佛仍能听到远古的回响：沸水濂波依旧涌动，如同文明的血脉从未停歇；而“绛老”与“天下第一县”的故事，则提醒我们——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蕴藏着制度变迁的密码，等待后人去解读。

“十景”诗画：山水间的文明记忆

翻阅《绛县志》，清人王授冕的排律《故绛十景串句》，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山水长卷赫然入目：“华峰晚照绛城东，石洞飞云报雨风。沸水濂波频涌碧，绛山晓日首敷红……”短短几十个字，藏着绛县的灵魂密码。

绛山晓日，十景之晴。近代邑人王永昶“羲和发轫天天早，照得山巅抹紫金”之句，道尽晋南丘陵日出时分的瑰丽。“绛”这个地名本身，就暗合朝阳染赤山峦之意象。立于紫金山巅东望，晨曦如金液泼洒峰峦，这景象让人想起史书记载晋国始祖唐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气魄。

沸水濂波被誉为十景之首，实非虚名。紫金山东麓的南樊镇沸泉，寒冬不冰，水汽蒸腾如釜中沸水。王授冕“沸水濂波频涌碧”七字，写尽这地质奇观的生命力。但此泉之奇不仅在于自然现象，更在于它与当地生活的交融——农民以泉水温度预测天气，妇女在泉边浣衣谝闲，孩童在氤氲水汽中嬉戏。这种自然与人文的深度交融，恰是绛县文明的特质。

其余诸景各有深意：石洞飞云是气象与地貌的共舞，每当云出洞岫，乡人便知山雨将至，这是农耕文明世代积累的自然智慧；柏林积雪非独雪景，更是“雪映古柏”的时空对话——晋国大夫的魂魄或曾在此徘徊，晋文公重耳流亡19年的霜雪亦曾落于相似的枝头；浍滩落雁则呈现一幅生态画卷，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

另一清代诗人王廷宾在其《故绛咏》诗中写道：“重耳陵碑瞻胜迹，唐尧故寓仰前贤。”这二联勾勒出绛县人文地理的双轴。横轴为地理空间：东谒晋文公墓，南瞻唐尧寓里，中跨绛侯周勃封地，西望姜嫄圣母祠堂，一条时空走廊自尧舜至汉晋迤逦展开。纵轴为精神脉络：从尧王爷“协和万邦”到晋文公“退避三舍”，仁义礼信如晋水潺潺浸润这片土地。

尤为动人的是龙涧春早。中条山深谷中，地脉先暖，涧草先绿。这不仅是物候现象，更是文明传播的隐喻——春讯自龙涧始，渐次染绿全县阡陌，恰似晋文化自绛县发轫，终成影响华夏的重要支脉。

10处国保：见证沧海桑田人间烟火

行走在绛县大地，10处国家级文保单位如同一部部打开的史书，分别对应着从史前到明清的文明层级，共同构成了一部地上地下交织的华夏文明编年史。

史前聚落，宏大启幕。历史的长卷，首先由两处遗址揭开序幕。周家庄遗址，面积达50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罕见的特大型聚落。它静静诉说着从仰韶文化到东周时期，长达数千年的文明接力。而横北倗国墓地的发现，则如同一束强光，照亮了典籍失载的西周倗国。带有“倗伯”铭文的青铜器、先秦典籍《周礼》中记载的“荒帷”（棺饰），以及上千座墓葬、数十座车马坑，无不宣告着这里曾是一个拥有高度礼乐文明的诸侯国。历史不再是文献中冰冷的文字，而是可触可感的实物证据。

梵音古刹，回响千载。宗教建筑是绛县古韵的华彩乐章。始建于唐永徽元年的太阴寺，其金代南大殿内供奉着我国最大的独木雕释迦牟尼涅槃像，佛像长4米，神态安详，雕刻技艺精湛，堪称佛教艺术瑰宝。这里更被考证为国之重宝《赵城金藏》的主要雕印地，在佛教传播史上地位非凡。与之相呼应的，是创建于元代的长春观玉皇殿，其建筑用材硕大、结构简洁，典型的元代风格扑面而来。而景云宫玉皇殿虽仅存一殿，但其前后檐铺作仍沿袭元代建筑风格，默默伫立在校园中央，延续着隋唐道观的余脉。

人间烟火，氤氲古今。文明的延续，更体现在世俗的烟火气中。南柳泰山庙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元、明、清建筑群，诸神共处一院，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多元与包容。董封戏台则是乡土文化的舞台，其“三面观”的抱厦设计，让乡民们能从不同角度观赏演出，曾是无数欢声笑语的源泉。绛县文庙的存世，则是儒家文化在此深耕的见证，大成殿与明伦堂赓续着崇文重教的传统。

岁月不语，有石能言。最为精美的艺术，往往献给最朴素的情感。南樊石牌坊是一座清代节孝坊，石雕仿木结构，极其复杂，浮雕、圆雕技艺登峰造极，每一处花纹、人物都讲述着一个关于家族荣誉与女性德行的故事。与之相似的道光年间乔寺碑楼，是周氏家族及乡友为资政大夫周禄在所建的功德碑，其首序由周禄在内侄、探花乔晋芳撰文，砖雕、石雕精美绝伦，堪称一座露天石刻艺术馆。它们将个人的荣光、家族的历史，用最坚硬的材料镌刻下来，以期永恒。

这10处国保，不是孤立的景点。它们是由时间书写，散落在绛县山川平野之间的珍珠。从最早的“县”制诞生，到地下埋藏的邦国、地上屹立的寺观、民间鲜活的戏台与牌坊，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完整、脉络清晰的文明演进序列。绛县之“重”，不仅在于它是“第一县”，更在于它用如此密集而连贯的物证，完美诠释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韧性与辉煌。在这里，历史是可读的，文化是可感的，每一步，都踏在文明的年轮之上。

地名之争：从“故绛”到火星的“古绛”

近来，文化学者杨金贵在万言长文《新绛：文承万古韵，商续九州风》中反复以“古绛”指称新绛历史，《运城日报》更以《古绛新韵唱大风》为题报道新绛发展成就。在许多绛县人心目中，“古绛”似乎应是绛县的代名词。本世纪初行政区划改革时，绛县城关镇被民政部定名为“古绛镇”，此名更被国际天文联合会采纳，以“古绛环形坑”之名铭刻于火星。

然而历史考据揭示了更复杂的真相。柴广胜曾担任多年的县文物局局长，其考证工作像福尔摩斯探案。他遍稽群籍，终在明代陶登的署名中发现线索——陶登署“古绛”，实为绛州（今新绛）进士；在元代太阴寺碑刻上找到证据：“古绛”与“本县（绛县）”并列，证实“古绛”乃绛州旧称。

这场地名之争，恰恰凸显了文明演进的层理：“故绛”是晋国古都的胎记，承载着《左传》绛老的智慧基因；“古绛”如同文化扩散的涟漪，见证着行政版图的变迁轨迹。

恰如晋水奔流，主干与支流彼此滋养。绛县作为“天下第一县”，其意义不在名称独占，而在文明基因的传承——那种从尧舜“协和万邦”到晋文公“退避三舍”的精神气质，早已超越行政区划，成为晋南文化的共同血脉。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2022年3月9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将火星上一个直径0.5公里的环形坑命名为“古绛”，成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科学成果的一部分。它与其他22个中国地名一起，构成了火星地理实体命名体系。按照命名规则，需要使用人口低于10万且具有历史文化关联性的地名——绛县古绛镇作为春秋晋国都城遗址所在地，完美符合这一标准。从地球到火星，“古绛”二字完成了一场跨越星球的旅行。这是地名的荣耀，更是文明连续性的诗意证明。

时空叠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今天，站在绛县街头，“天下第一县”的标识与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街头广场，数字技术展示着名胜古迹的不朽风采；学校课堂上，孩子们在校本教材里了解尧的传说、“绛老”故事，探讨地名变迁、社会发展。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正是绛县最动人的地方。

“车厢城遗址”是这种交融的绝佳例证。该晋国古都遗址背依湫池山，地势险峻，《史记·晋世家》载“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后代迁绛，晋献公遣重臣士蔿在此筑城。当我们立于遗址残垣，看“湫池山顶舒光影”，耳边或响起《左传》中晋楚邲之战战车之隆隆，眼前却已是“黎元乐沐共和天”（王廷宾语）的和平图景——此为绛县最厚重的时空叠影。

黄昏时分，立于浍水之滨，看“雁落浍滩霜月朦”的意境在暮色中渐显，远处华山晚照的余晖将尽。你会忽然体悟，“绛县十景”已成为故绛的文化载体——山水是形，诗文是影，历史是脉，民生是魂。从《左传》绛县老人的智慧，到辛亥革命“狂飙除帝制”（见王永昶诗）的现代觉醒，再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这片土地始终在古老地理中孕育新生。

绛县之“第一”，不在起点，而在延续。当沸水濂波依然氤氲，当绛山晓日每日新生，当“古绛”之名在火星环形坑上闪耀，自春秋绵延至今的文明脉络，仍在黄土沟壑间搏动，帮助今人去读懂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

书评

两“千”道尽“红与白”

——品读冯建国先生《千古中条一池雪》《千秋武圣一关公》

■邹光存

近日，老乡文友冯建国先生赠予我两部新作《千古中条一池雪》和《千秋武圣一关公》。我拜读后感慨良多，两条文化的江河在眼前交汇奔涌。这两部著作，一部写“白”，一部描“红”，一池白色盬盐映照千古，一位红脸关圣光耀千秋。作者以简约通透的笔触，将河东大地上最深沉、最耀眼的两大文化瑰宝，鲜活呈现在读者面前，堪称宣传关公文化与盐文化的绝唱。

化艰深为通俗：两部厚重的“文化导游图”

书写地域文化，最忌两种倾向：或流于浮光掠影的浅说，或陷入考据艰深的迷宫。冯建国先生的这两部作品恰恰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我把它定位为“通俗读本”，却绝非简单化的“快餐”，而是作者深耕河东文化沃土数十载后，精心萃取的精华。

《千古中条一池雪》，面对的是沉默的盐池与浩瀚的盐业史。作者没有过多堆砌枯燥的数据和年代，而是将盐池拟人化，从“中条山下一池雪”的诗意起笔，讲述这池“雪”如何滋养了最早的“中国”，如何牵动历代王朝的兴衰，如何融入百姓的日常生计与精神信仰。他将地理、历史、经济、民俗巧妙编织，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领悟到这一池卤水实则是中华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咸”。

《千秋武圣一关公》，则面对一位被历代文豪塑造，已然“神化”的文化符号。作者另辟蹊径，以扎实的史料和民间传承为基，着重剖析关公从历史名将到万能之神的演变轨迹，尤其是对其“忠、义、仁、勇、信”精神内核的现代解读，尤为精到。书中既有对关羽生平事迹的清晰梳理，更有对关公文化如何融入建筑、戏曲、商界、民间信仰乃至海外华人世界的生动展现。读罢方知，关公早已超越一尊神祇，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道德坐标和文化纽带。

融学术于故事：可读性与传播性的完美结合

这两部书之所以引人入胜，关键在于其极强的可读性。冯建国先生深谙传播之道，他摒弃了学究气的论述，采用了娓娓道来的故事化叙事。

在写盐文化时，他笔下既有舜帝抚琴，蚩尤血化盐池的古老传说，也有“捞盐工”“堰畦浇晒”等具体生产场景的鲜活描摹，让冰冷的盐粒有了温度。在写关公文化时，他不仅讲千里走单骑的英勇，也讲民间“剃头匠奉为祖师”的趣谈，还剖析“关公战蚩尤”传说背后蕴含的地域文化融合密码。这种写法，使得高深的文化知识变得亲切可感，如同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在灯下与你漫谈家乡的往事与荣光，极易引发共鸣，具备天然的传播力。

书中恰到好处地引用典籍，既增强了说服力，又平添了雅趣。谈及盐池的战略地位，会引出《史记》中的记载；解读关公的“义”，会联系《春秋》大义。这些引用如同精心点缀的星光，照亮了叙述的脉络，却毫不晦涩，始终服务于“通俗通透”的主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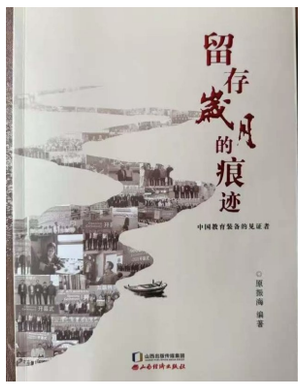
倾毕生于挚爱：一位文化守望者的赤诚奉献

冯建国先生进入古稀之年，一生钟爱河东文化，著述约八百万字，可谓著作等身。这份成就，绝非偶然的热忱，而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深耕。他曾任运城市税务稽查局长，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将所有的闲暇与心力都投注于田野调查、文献爬梳与伏案写作之中。这种“业余”状态下的专业追求，更显难能可贵。

从这两部“通俗读本”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学术的“简化”，而是学识的“醇化”。他将浩如烟海的史料，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经过自己多年的消化、思考和提炼，最终凝结成这两部脉络清晰、观点鲜明、通俗易懂的著作。这背后，是一位赤子对家乡文化深沉的爱与自觉的担当。他是在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将河东的文化家底加以盘点、梳理和传播，让深藏于典籍与遗址中的文化魂脉，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滋养更多人的心灵。

总而言之，《千古中条一池雪》与《千秋武圣一关公》，是两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地域文化普及读本。它们犹如一双慧眼，带我们看透了河东文化的“红”与“白”；它们又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历史的深邃与当代的认知。冯建国先生以七旬之龄，用生花妙笔道尽千年文化，其功甚伟。这两部书的出版，不仅是对冯先生个人学术生涯的精彩总结，更是对河东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有力传播与贡献。推荐每一位对华夏根脉，对忠义精神，对地方风物感兴趣的读者，都能展卷一读，从中获得知识的启迪与文化的浸润。

《留存岁月的痕迹》太原首发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 实习生 **续思颖**）1月30日，原振海新书《留存岁月的痕迹》首发式在太原举行，30余位嘉宾出席。

该书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由原振海在2024年《我的平淡人生》基础上改编而来。全书53万字，共分为九个篇章，从求学时光到教育管理履职，记叙了把教学仪器厂从弱小企业打造为国家级先进集体的奋斗全过程，尤其重点叙述了连续参与86届中国教育装备协会的经历。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合影、会议资料、书信往来、荣誉证书等珍贵实物，突破传统回忆录形式，以“实物证史”的方式，呈现了原振海的人生历程与行业深耕足迹。

全书版式新颖、图文并茂，既记录了个人成长与行业发展，也饱含师生情、同事情等时代情感，为读者搭建起触摸岁月，品读教育发展的文化桥梁。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副总编辑吕应征表示，这部著作兼具史料性、专业性与可读性，既展现了原振海先生在教育管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思考与实践，也为当代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与精神滋养。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第六届会长王富特向首发式发来贺信，肯定该书出版对教育装备行业的重要意义。

运城中华文化促进会扎实助推河东文化繁荣发展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1月27日，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二届三次理事会在太原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安排部署2026年工作。文促会理事、各市文促会和省城有关文化组织参加会议。

会议为2026年工作谋篇布局，明确了目标、厘清了路径，为全年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指出，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文化传承的思想根基与政治保障；深化协作联动，激活三晋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创新动力；聚焦品牌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与效能；强化系统建设，夯实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组织基础；2026年重点推进铸魂领航、智库赋能、品牌塑造、人才吸纳、系统强基五大工程，以文化之力继续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运城中华文促会自2022年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山西中华文促会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连续四年指导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2025年参与指导了第36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和第四届后稷论坛，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议对运城中华文化促进会工作予以肯定，运城中华文促会深耕河东文化沃土，践行使命担当，组织编撰的《运城简史》以严谨体例、精炼文字、丰富史料，清晰勾勒出河东大地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发展脉络，填补了运城地域文化的学术空白。运城中华文促会一班人借力、给力、出力，是工作成效显著的优秀组织，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为全省各市文促会树立了典范。

运城中华文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落实此次理事会精神，围绕“一城两区三门户”的总体目标和思路，按照市委宣传部的安排部署，扎实工作，勇毅前行，为河东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月2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从礼介绍自己创作的“骏马迎春”葫芦。

进入农历腊月中旬，晋南一带的年味愈浓，各种“马”元素的非遗产品层出不穷。运城市非遗代表性项目万荣葫芦烙画代表性传承人吴从礼组织人员，把种植、收购的1000多个葫芦精心整理，借助烙画和彩画工艺，精心创作出《马到成功》《骏马送福》《飞马迎春》等以“马”为主题的十多个类型的葫芦作品，以满足北京、四川、太原等地客户及当地市民线上线下选购。

特约摄影 **李克荣** 摄

小特写

手工花馍俏 河津年味浓

本报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曹文娟

巧手生“花”，有“馍”有样。在晋南地区，馄饨花馍不仅是餐桌上的传统美味，更是指尖上的非遗艺术。它承载着千年民俗的温情，寄托着人们对吉祥安康、团圆美满的质朴祈愿。近日，河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馄饨花馍制作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市民与返乡大学生触摸传统文化脉搏、体验晋南地道年味。

走进设于河津市城西芸心果蔬花馍定制店的活动现场，浓浓年味扑面而来。麦香氤氲中，市民与返乡大学生代表围坐一堂，共同迎接一场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味的馄饨花馍制作体验交流活动。馄饨花馍艺人首先为大家讲述了河津馄饨制作技艺的非遗渊源与文化寓意，从逢年过节蒸制的团圆馄饨，到婚庆寿宴定做的元宝、寿桃、醒狮等造型花馍，每一款馄饨花馍不仅是传统技艺的展现，更是真情实感的凝结，深植于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

在“捏花样”环节，馄饨花馍艺人通过现场演示，把复杂的传统工艺逐步分解。参与者们认真聆听、动手尝试，揉面、搓条、捏形、点缀，指尖翻飞间，原本普普通通的面团渐渐绽放为栩栩如生的艺术模样。

此次活动将劳动实践、非遗传承与新春民俗融为一体，让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传统非遗的鲜活表达与地方文化的深厚积淀。据了解，此次活动属于“非遗贺新春 寻味中国年”河津非遗迎新春系列活动之一。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 对 **李 楠** 美 编 **冯潇楠**